

# 思想观念、非正式制度变迁与“陕西现象”解读

蔡立雄<sup>1,2</sup>

(1. 西北大学 中国西部经济发展研究中心, 陕西 西安 710069;  
2. 龙岩学院 人文与教育学院, 福建 龙岩 364012)

**摘要:**为更好地促进陕西经济社会的发展,运用制度分析方法对“陕西现象”背后的制度原因进行深入分析。分析认为:“陕西现象”的形成在于人们还没有形成与现代市场经济发展相适应的思想意识和非正式制度,经济发展缺乏足够的动力和环境,从而使资源不能得到优化配置和充分利用,因而经济增长速度远低于潜在的增长率;改变“陕西现象”的必要途径是应当充分利用中国经济变革时代所提供的内外条件,革新旧的思想意识和非正式制度。

**关键词:**制度经济学;陕西现象;思想观念;非正式制度

**中图分类号:**F12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1-6248(2008)02-0076-06

据中国现代化战略研究课题组发布的《中国现代化报告》数据,2001年陕西省第一次现代化实现程度为81%,在中国内陆地区排第9位,第二次现代化的实现程度为38%,排第6位;2004年第一次现代化的数据为87%和第12位,第二次现代化数据为44%和第6位(与江苏、广东并列)。第一次现代化强调按三次产业结构的构成情况和社会服务水平评价,第二次现代化则更强调知识创新能力与教育水平。陕西在两次现代化排名中均处于全国前列,但经济发展却长期落后于全国平均水平(人均GDP排名在20位以后),有人据此提出“陕西现象”的概念。它是指在陕西社会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出现的一系列不协调发展的现象,即高新科技与比较落后的经济并存;先进的文化与保守的思想观念并存;蓬勃发展的高等教育与落后的基础教育并存;经济发达的关中地区与贫穷的陕南、陕北并存;实力雄厚的国防工业与薄弱的中小工业并存;高收入阶层与广大城乡居民的低收入并存;全国综合竞争力评价中,知识化、网络化的高名次与经济发展指标的低

名次并存等<sup>[1]</sup>。“陕西现象”一经提出便在经济学界引起重大反响,按照新古典经济学和新增长理论关于经济增长源泉的理解,陕西省矿产资源、劳动力、技术、人力资本等指标在全国排名居前,经济增长却依然乏力?学者们分别从不同角度提出了解释。上官鸣从经济结构角度指出:由于陕西轻工业与重工业比例失调、轻工原料输出与轻工产品输入比例失调,两个比例失调对“陕西现象”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sup>[2]</sup>;王俊熙从人力资本存量结构出发提出:由于人力资本存量结构、知识结构、区域分布结构与经济结构、市场需求结构存在较大失衡,使陕西人力资本不能发挥出促进经济增长的效应<sup>[3]</sup>;常永华利用灰色关联分析方法得出制约陕西省经济与科技发展的主要原因是科技贡献能力和科技产出能力较低所致<sup>[4]</sup>;白永秀认为:观念滞后——大量存在的与现代市场经济发展相背离的自然经济观念、小商品经济观念、计划经济观念阻碍了陕西发展<sup>[5]</sup>;还有一些学者从正式制度建设、外资引进、经济地理因素等方面加以论证。

收稿日期:2007-11-12

基金项目:陕西省教育厅社科基金课题(03JK018)

作者简介:蔡立雄(1973-),男,福建漳州人,龙岩学院副教授,西北大学经济学博士研究生。

市场经济是逐利经济,在利益的引导下,资本、人力资本将投向最稀缺、最能获利的地方,而陕西长期存在经济结构和人力资本结构不合理、投资效益低下,正是由于市场经济发育不充分所致。为此,笔者基本赞同白永秀教授的观点,但问题是中国改革开放已走过三十年的历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基本建立,陕西人民的思想观念为何还不能实现根本性转变?思想观念是如何影响经济发展的?“陕西现象”是如何出现并被强化的?如何创造条件以实现传统观念的根本转变?笔者试图从制度经济学角度对上述问题进行梳理和解释。

## 一、制度与思想观念的关系 以及非正式制度变迁

### (一) 制度与思想观念的关系

思想观念本身并不是制度。亨廷顿认为:“制度就是稳定的、受珍重的和周期性发生的行为模式”<sup>[6]</sup>;诺斯认为:“制度是社会游戏(博弈)的规则,是人们创造的用以限制人们相互交流行为的框架”<sup>[7]</sup>;“制度提供了人类相互影响的框架,它们建立了构成一个社会,或更确切地说一种经济秩序的合作与竞争关系”<sup>[8]</sup>;“制度是一系列被制定出来的规则、秩序和行为道德、伦理规范,旨在约束主体福利或效用最大化利益的个人行为”<sup>[9]</sup>。可见制度主要是一种行为规则、行为规范,而思想观念是个人在实践中形成的对世界、人生等方面稳定的看法。单个人的或一时的思想观念并不能影响经济社会的长期发展,只有当某种思想观念被理论化、系统化为意识形态并为一个人群长期接受和继承时,才对经济社会的发展造成根本性的影响。意识形态还是制度形成和维系的基础,青木昌彦认为,制度是共有信念的自我维系系统,是由有限理性和具有反思能力的个体构成的社会的长期经验的产物;制度也许存在于人们意会的理解之中,也许存在于人们头脑之外的某种符号表征之中,但在任何情况下,某些信念被参与人共同分享和维系,由于具备足够的均衡基础而成为制度<sup>[9]</sup>。可见,制度产生的基础是人们在长期社会经验中形成某些信念,信念表征泛化而被一群人共同分享和接受而形成制度;当人们共同接受的信念动摇时,以此为基础的制度就会消亡。

### (二) 非正式制度变迁

制度包括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制度变迁的原因在于制度失衡,林毅夫总结了制度失衡的四种

原因:制度选择集合的改变、技术的改变、制度功能需求的改变以及有关制安排的改变<sup>[10]</sup>。但不同的制度类型的变迁方式是不同的,一般认为,非正式制度具有自我实施的性质,具有较大的路径依赖性,而且在社会制度结构中占据主体地位。诺斯认为,“正式制度即使在最发达的经济中也只是决定选择的总约束中的一小部分,人们行为选择的大部分行为空间是由非正式制度约束的”<sup>[11]</sup>。因而非正式制度的变迁速度较慢,“从变革的速度来看,正式约束可以在一夜之间发生变化,而非正式制约的改变却是一个长期的过程”<sup>[12]</sup>。正式制度具有强制实施的性质,因而在掌握权力的少数人通过制度设计或引进可以在短期内实现强制变迁,但正式制度的引进移植受到非正式制度的强大约束。“即使能从国外借鉴良好的正式规则,如果本地非正式规则因为惰性而一时难以变化,新借鉴来的正式规则和旧有的规则势必产生冲突。其结果是新借鉴来的制度根本无法执行”<sup>[13]</sup>。而非正式制度并非总是能移植的,“一种非正式规则,尤其是思想观念形态能否被移植,其本身的性质规定了它不仅取决于所移植国家的技术变迁状况,而且更重要的是取决于文化遗产对移植对象的相容程度”<sup>[14]</sup>。

由于正式制度的可设计性、可移植性和强制实施性,因此思想观念对制度的影响主要在于非正式制度。而思想意识和非正式制度的变迁都具有路径依赖性和滞后性的特点,它们的变迁不仅取决于行为主体对变迁的收益和成本的计算,更重要的取决于一个群体的学习能力、旧思想意识和制度的厚度<sup>[15]</sup>和稳定性。

## 二、思想意识、非正式制度与 经济增长的互动性

### (一) 意识形态提供了社会共同的信念

意识作为一种理论化、系统化的思想观念,提供了一个社会共同的信念。马克斯·韦伯认为新教伦理强调的功能主义与禁欲主义在资本主义产生和发展过程中起了重要的作用。功能主义将获取经济利益作为人生的最终目的,将谋取利益看作是增添上帝的荣耀,信徒要以入世的精神去尽可能多地获取物质利益;禁欲主义强调反对非理性的使用财产、限制消费欲求,鼓励将财富转化成投资并以正当的、合乎道德要求的方式去发展生产,实现资本增殖<sup>[16]</sup>。

创造财富与获取利益成为社会共同信念的条件下,与资本增值有关的一切行动合理化了,经济增长受到激励,与此同时,一切与财富创造相违背制度丧失了合理化甚至合法化的基础,资本主义制度从而得以建立并进一步促进了经济发展。有关意识形态的作用在诺斯的《制度、意识形态和经济绩效》一文和《经济史上的结构和变革》一书中得到更详细的阐述。(1)意识形态是使个人和集团行为范式合乎理性的智力成果。(2)意识是一种节省的办法,个人用它来与外界协调,并靠它提供一种世界观使决策过程简化。(3)成功的意识形态,应当说明现存产权结构和交易条件怎样构成一个大系统中的一部分。(4)对意识形态的投资也是对制度“合法性的投资”,它能够降低制度维护和执行的成本。(5)长期的经济变革之所以发生,不仅是因为相对价格的变化,而且由于意识形态的演进,每当由于不同经验而大相径庭时,企业家便涌现出来。

从诺斯的论述中可以整理出意识形态与经济增长相互影响的机理:意识形态提供了人们行动的世界观、公平观和价值观,共同的成功的意识形态降低了个人与社会协调和集体行动以及制度维护、执行的成本,从而使经济实现长期增长,经济增长使个人产生了新的经验并促进了分工和专业化,经济交流使处于不同地理位置的人和从事不同工作的人可以交流经验,进而促进人们改变思想观念(或意识形态),意识形态的改变反过来又成为长期经济变革的原因。

## (二) 非正式制度提供了人们行动的共同知识

新制度经济学家认为,制度有以下一些基本经济功能:节约功能、约束功能、规范功能、激励功能、创造和扩散信息功能。但这些功能都是一些衍生功能,制度的基本功能应该是提供了人们行动的共同知识<sup>[17]</sup>。肖特认为,在一人口群体  $P$  中,当其成员在一重复出现的境势  $\Gamma$  下,作为当事人常规性的知识  $R$  只有在下列条件下成为人口  $P$  中的共同知识时,它才成为一种制度。(1)每个人都遵同  $R$ 。(2)每个人都预计他人会遵同  $R$ 。(3)  $\Gamma$  是一个协调问题,而一致遵同又是  $\Gamma$  中的一种协调均衡,或者在他人遵同  $R$  的条件下每个人又乐意遵同它。(4)如果任何一个人偏离了  $R$ ,人们知道其他人当中的一些或全部会偏离,在反复出现的博弈  $\Gamma$  中采用偏离策略的得益对于所有当事人来说都要比与  $R$  相对应的得益低<sup>[18]</sup>。

制度是人类行为的规范或约束规则的总称,它是为一个人所共享并共同遵守知识、规则或信念系统,由此形成一种稳定的社会秩序,任何单独偏离规则的行动都会使当事人受损,因而当制度形成后在一定程度上是自我实施的。作为共同知识的制度提供人们行动的基本框架,使人们对行动的结果产生稳定的预期。理性预期学派认为:人们在形成对未来预期时会有效地利用所获得的信息,采取行动受到预期的很大影响,而预期的实现又依赖于现在的行动,因此行动和预期是一个相互自我实现的过程,并和谐地融为一体<sup>[19]</sup>。共同知识使人们对信息解释有了共同的知识基础,减少了不确定性,从而节约了交流、互动、交易的成本;共同知识使人们获得了对行动的共同评价基础,违背共同认知的行动将受到惩戒,从而使社会有了进行有序竞争与合作的条件,促进了社会分工的发展和效率的提高;共同知识还限制和规范了人们的行为选择集合与方向,人们要想在行动中获利,只能采取与集体共同知识要求相匹配的行动,从而抑制了机会主义的行动,当共同知识与经济发展的要求相一致时,人们追求个人利益的行动必然同时增进社会利益;某些共同知识本身就具有经济价值,如对货币、产权保护的一致同意等。不仅适当的制度构成经济长期增长的条件,经济的发展反过来也促进制度变迁,经济发展改变了要素和产品的相对价格,拓展了制度的选择集,使现有的制度结构失衡,进而促使人们重新计算制度变革的收益和成本,制度变迁因而得以发生。

## (三) 意识形态和非正式制度影响经济绩效

意识形态和非正式制度不仅通过自身的力量影响经济增长,还通过约束正式制度的制定和实施效率影响经济绩效。意识形态是判断正式制度设计与实施公平与否的基础,如果正式制度的设计符合意识形态公平观的理念,它将得到民众的支持,从而能够降低实施成本并提高实施效率;非正式制度不仅影响正式制度的移植效率,它在一定程度上也是正式制度制定的基础。凡勃伦认为:“制度实质上就是个人或社会对有关的某些关系或某些作用的一般思想习惯;而生活方式所构成的是在某一时期或社会发展的某一阶段通行的制度的综合。因此,从心理学方面来说,可以概括地把它说成是一种流行的精神状态或一种流行的生活理论”<sup>[20]</sup>。非正式制度从哈耶克人类学习的认知科学思路的角度看,是一种集体学习,“集体学习不仅是一种静态的集合物,

而且是一个动态的获取、积累、筛选和传递知识的过程。跨越时间的集体学习作为一个文化积淀和观念调整的过程,它不断改变人们对于机会、选择和制度合法性的认识,而这正是制度持续变迁动力的源泉”<sup>[21]</sup>。因此,正式制度要反映非正式制度的要求或至少与非正式制度相兼容才能够发挥最大效率,与非正式制度相冲突的正式制度往往会造成制度失灵现象。

### 三、陕西地方意识与非正式制度的路径依赖及其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路径依赖原本是技术发展中的一种现象,诺斯在考察制度变迁时引入这一概念并用以描绘过去的制度绩效对现在和未来的影响。他认为一国经济一旦走上某一发展轨道,它的既定方向会在未来的发展中得到强化,这种强化表现为两种不同的结果:一是收益递增的良性循环轨道,二是无效率的锁定状态。而路径依赖之所以发生,“正是文化提供了路径依赖——过去对现在和将来强有力的影响——的精义。任何一代人当前的学习都是在集体学习中所获得的知识渊源中进行的,亦就是说,学习几乎是这样一种道路的函数,通过这一道路,一种给定的信仰结构对源于经验的信息和不同时代的个体与社会面临的不同经验进行过滤”<sup>[22]</sup>。文化在两个层面提供了路径依赖的依据:一是在精神层面上塑造了人的价值观,二是在行为层面上沉淀成为人的习惯、道德行为等。

#### (一) 旧的思想意识与非正式制度是路径依赖的源泉

中国传统文化是与自然经济相适应的,在价值取向上是重义轻利,在行为上表现为安分知足、重土恋家、求稳怕险、封闭守旧等。陕西是以农耕为基础的中华文明的发源地之一,是十三朝古都所在地,与其他省份相比有着更为厚重的文化积淀。厚重的文化积淀促成了以此为基础的占主体地位的社会意识和行为习惯,形成了稳定的非正式制度,这样的制度厚度加大了陕西思想观念和制度转型的成本,从而强化了路径依赖性。

与计划经济相对应的是平均主义的意识,在行为上表现为等、靠、要等,结果是循规蹈矩、按部就班、平平安安。陕西相对发达的国防工业、重工业是计划经济时代的产物,在现代又成为维持计划经济

思想意识和非正式制度的物质基础。

在历史上,小商品经济是自然经济的补充。在整体经济非市场化的条件下,农民没有非农化生产的机会、动力和能力,即使人们在汉代早已认识到“以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但农民从事工商业主要不是为了发家致富,而是在自然经济活动不能满足人们的基本需要时的一种临时性行为;虽有部分农民因农商之间收益不均衡现象而弃农就商,“但是这只是他们短期性的打算,一旦他们经商成功,累积了资本,他们又回过头来,挟其资金购买土地,‘以本守之’”<sup>[23]</sup>。可见,传统的小商品经营者是由农民转化而来的,最终的目标是回归农民(或地主)角色,而且资本规模较小、抗风险能力薄弱,在经营上目光短浅、没有长期计划,把商品流通仅视为简单的交易行为、没有足够的服务意识,因而在思想观念和行为上虽具有一定开拓意识,但在本质上与自然经济时的思想意识和行为相匹配。历史上陕西小商品经济曾经比较发达,在改革开放后,小商品经济观念和经营方式得到一定复兴。

#### (二) 旧的思想意识与非正式制度对陕西经济发展的影响

一定的思想意识和非正式制度只有与经济增长的要求相适应才能促进经济增长,否则只能成为经济发展的障碍,这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制度经济学共同揭示的基本原理。陕西浓厚的自然经济、计划经济、小商品经济的思想意识和非正式制度在整体经济越来越市场化的今天,却成为经济增长和市场经济发展的障碍。

1978年陕西人均GDP在全国排名第21位,为全国平均水平的77.5%;1980年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列第21位,农民人均纯收入与全国平均水平相同,排第16位;1998年陕西人均GDP仅高于西藏、贵州、甘肃,排倒数第四位,仅为全国平均水平的60.4%,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列倒数第28位,农民人均纯收入仅为全国平均水平的65%,排第28位;2005年陕西人均GDP在全国排第23位,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70.4%,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列第26位,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仅为全国平均水平的63.1%,排第29位。改革开放以来,陕西省无论是整体经济水平还是人民生活水平,在全国中的相对地位都恶化了,近年来整体经济虽有所改善,但仍未回复到改革开放初的地位。

樊纲和王小鲁根据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非国有经济的发展、产品市场的发育程度、要素市场的发育

程度、市场中介组织发育和法律制度环境五个方面指标,对全国除西藏外的30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的市场化进程进行排名,1997~1999年和2000~2002年两次排名,陕西均位于第22位,仅高于西北其他四省和云南、贵州、内蒙古和黑龙江。在最能体现经济市场化活力的非国有经济发展的排名方面,1999年陕西排名第23位,2002年则下滑到第25位<sup>[24]</sup>。

陕西不乏经济增长所必需的要素,政府也在大力推进市场化建设与发展,但经济发展依然不如意。也许卡拉·霍夫和斯蒂格利茨以及英格尔斯的研究可以对本文的分析作一个结论。卡拉·霍夫和斯蒂格利茨根据俄罗斯的经验指出:“自然资源相对于工业品的较大比重降低了对法治的政治需求,从而降低了法治产生的可能性。”“我们的模型为这一现象提供的解释与一个几乎被广为接受的观点有关,这一观点认为‘自然资源实际上是当前发展中国家的一个魔咒’”<sup>[25]</sup>。英格尔斯指出:“痛切的教训使一些人开始体会和领悟到,那些完善的现代制度以及伴随而来的指导大纲、管理守则,本身是一些空的躯壳。如果一个国家的人民缺乏一种能赋予这些制度以真实生命力的广泛的现代心理基础,如果执行和运行这些现代制度的人,自身还没有从心理、思想、态度和行为都经历一个向现代化的转变,失败和畸型发展的悲剧结局是不可避免的。再完善的现代制度和管理方式、再先进的工艺,也会在一群传统人的手中变成废纸一堆”<sup>[26]</sup>。

## 四、陕西地方意识与非正式制度约束变迁的条件与路径选择

陕西传统的地方意识与非正式制度互相联结,产生区域性的制度同构和路径依赖现象,强制的转变需要巨额成本,需要引入外部资源,创造出陕西地方意识与非正式制度变迁的基本条件,以此诱致理性的企业家出现,采取适当的路径以实现变迁。

### (一) 陕西地方意识与非正式制度变革的条件

实现陕西地方意识与非正式制度变革的条件来自于中国发展的大环境。经济社会的发展要求地方意识与非正式制度实现变革的同时,也为这种变革准备了四个条件。第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为中国低成本地吸收外来先进文明提供了机遇。第二,信息技术的发展降低了文化的搜寻成本和试误成本,也为快速地传播新观念、新知识提供了平台,从而有

助于在较短时间内形成新的思想意识和制度。第三,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不断冲击着人们的旧观念,又提高了民族自信心和凝聚力,二者的合力易于使人们采取集体行动变革旧文化、建立新文化。第四,中国人民站起来、富起来的业绩奠定了中国共产党在中国人民心目中的崇高地位,从而有利于全社会形成统一的思想意识和心理预期,也有利于降低制度变迁的阻滞成本和协调成本;一个执意于改革和有远大志向的政党长期执政还有利于提高制度变迁效率,降低制度的实施成本。

### (二) 陕西地方意识与非正式制度革新的途径

地方意识的深层性和非正式制度的难移植性决定了它们变革的高成本,对陕西而言,要成功地实现革新,一是要积极地参与全球化,拓展对外交流的广度和深度,在对外交流中增进知识、变革观念、获取替代经验。二是要积极总结经济发展成果。经济发展是文化发展的基本动力和物质条件,经济的发展要求形成与之相适应的世界观、价值观和公平观,市场经济的创富本性并由此形成的一系列实践不断冲击人们安贫乐道、重土恋家、求稳怕险自然经济观念和等、靠、要的计划经济观念。现代市场经济的稳定发展、可持续发展、有序发展理念又对传统市场经济中只要个人利益不要整体利益、只要经济利益不要社会利益的观念提出变革要求,新的理念、经验、思想作用于社会形成新的社会心理。这种社会心理要变成文化变革的实际行动,需要建立在新的社会心理和经验基础上的系统化的理论支撑,也就是要实现经济理论的中国化,使之与我们的民族心理中的优秀成份相兼容,才能成为全民的共同信念和共同知识。三是要加强新思想、新观念的传播。市场经济制度的产生是文化长期积淀的成果,“制度结构和具有市场理念的个人又是长期历史发展的产物,认为市场可以在没有历史、没有制度结构和没有市场理念的条件下形成并发挥作用的想,是一种天真的想法”<sup>[27]</sup>。陕西缺乏现代市场经济发展的历史,当然不可能有相应的理念产生,为此要通过理论和鲜活的事例教育人民,向人民灌输市场经济的观念和知识。四是要鼓励人口流动。双向的人口流动是稀释旧文化厚度、传播新文化极为有效的形式。历史上北方人口向南方大规模迁移加速了南方文明化的历史进程,改革开放以后大规模的民工潮加快了农村经济、社会和思想的现代化。五是在反思与综合中创新。文化,尤其是观念文化和非正式

制度的延续性、继承性特征,决定了文化的革新不可能割断与旧文化的联系而实现全新的建构。因此,在创新传统文化的同时,也要弘扬传统文化与现代社会经济相兼容的优秀成份。当前要注重弘扬周文化的以人文为本、敬德崇礼的精神;秦文化的法治与效率精神,汉唐文化的开放、进取、竞争、宽容精神,还要弘扬延安精神中海纳百川、负重前行、敢为天下先的精神等。传统文化已在人们的思想和行为中高度内化,因而弘扬其中优秀成份是革新意识形态和非正式制度的最经济途径。六是政府要强化正式制度制定与实施的科学性和严肃性。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政府和正式制度作为一种强有力的存在必然对人们的心理和行为产生重大影响。

## 五、结 语

经济社会的发展要求要有与之相适应的思想意识和非正式制度,以便为它提供合理化的支持并提供人们行动规则和基本框架,进而实现低成本、高效率的发展。经济的发展不仅提出建设新思想意识和非正式制度的必要性,而且准备了物质基础和经验素材。思想意识和制度为经济发展提供了共同信念和共同知识。共同信念使经济主体拥有共同的世界观、价值观和公平观,成功的思想意识降低了个人与社会协调和集体行动以及制度维护、执行的成本,从而使经济实现长期增长;与经济发展相适应的共同知识使经济主体对未来形成稳定的预期,减少了不确定性,从而节约了交流、互动、交易的成本,还提供社会进行有序竞争和合作的条件,促进了社会分工的发展和效率的提高等。思想意识和非正式制度还通过影响正式制度的制定与实施效率影响经济发展。“陕西现象”的形成在于,人们还没有形成与现代社会经济发展相适应的思想意识和非正式制度,经济发展缺乏足够的动力和环境,从而使资源不能获得优化配置和充分利用,经济增长速度因而远低于潜在的增长率。改变“陕西现象”的必要途径是革新旧的思想意识和非正式制度。要充分利用这个时代和中国经济大变革所提供的优良条件和社会环境,以反思和教育促进改变,以政府和舆论引导改变,在发展中完成改变。

### 参考文献:

- [1] 钟京. 关注“陕西现象”[J]. 发展, 2003(10): 27-28.
- [2] 上官鸣. 对“陕西现象”的思考[J].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06, 6(4): 111-114.
- [3] 王俊熙. 陕西人力资本存量与经济协调发展的对策研究[J]. 西安财经学院学报, 2005, 18(3): 94-97.
- [4] 常永华. 陕西科技与经济异动的现象及机理研究[J]. 科学学研究, 2004, 22, (4): 388-390.
- [5] 白永秀. 观念滞后: 中国经济发展的瓶颈: 以陕西为例[J]. 唐都学刊, 2002, 18(2): 5-13.
- [6] 亨廷顿. 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M]. 王冠华, 刘为, 译. 北京: 三联书店, 1989.
- [7]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 经济学与中国经济改革[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5.
- [8] 诺斯. 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M]. 陈郁, 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1.
- [9] 青木昌彦. 比较制度分析[M]. 周黎安, 译. 上海: 上海远东出版社, 2001.
- [10] 科斯. 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M]. 陈郁, 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4.
- [11] 诺斯. 制度、制度变迁和经济绩效[M]. 刘守英, 译.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1994.
- [12] 詹姆斯·A·道. 发展经济学的革命[M]. 陈郁, 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
- [13] 孙宽平. 转轨、规制与制度选择[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4.
- [14] 卢现祥. 新制度经济学[M]. 北京: 中国发展出版社, 2003.
- [15] 吕拉昌, 魏也华. 新经济地理学中的制度转向与区域发展[J]. 经济地理, 2005, 25(4): 437-441.
- [16] 马克斯·韦伯.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M]. 于晓, 陈维纲, 译.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6.
- [17] 张圣平. 偏好、信念、信息与证券价格[M]. 上海: 上海三联出版社, 2002.
- [18] 肖特. 社会制度的经济理论[M]. 陆铭, 陈钊, 译. 上海: 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2004.
- [19] 帕特里克·明福德. 理性预期宏观经济学[M]. 方福前, 刘小波, 译. 北京: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98.
- [20] 凡勃伦. 有闲阶级论[M]. 蔡受百,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64.
- [21] 谭崇台. 发展经济学的新发展[M]. 武汉: 武汉大学出版社, 1999.
- [22] 诺斯. 动态经济世界中的经济理论[J]. 经济译文, 1995(3): 1-6, 17.
- [23] 赵岗. 中国传统农村的地权分配[M]. 北京: 新星出版社, 2006.
- [24] 樊纲, 王小鲁. 中国市场化指数: 各地区市场化相对进程 2004 年度报告[M]. 北京: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4.
- [25] 卡拉·霍夫, 斯蒂格利茨. 大爆炸之后: 后共产主义社会法治形成的障碍[C]//吴敬琏. 比较: 第17辑.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05: 117-134.
- [26] 英格尔斯. 人的现代化[M]. 殷陆君, 译. 成都: 四川

(下转第105页)

## Theory of human nature of Lin Shen-si and its value for moral education

ZHAO Qing-wen

(School of Philosophy and Public Administration, Henan University, Kaifeng 475001, Henan, China)

**Abstract:** The present moral construction links closely with traditional moral education. The discussion of the ancient Chinese moral education can provide beneficial instruction for the current moral construction. This paper, from the theory of human nature and the philosophy foundation of the theories of Chinese traditional moral education, observes the the theories of moral education of Lin Shen-si, who lived at the end of Tang Dynasty, analyzes his main standpoint about the necessity, possibility, method, path of morals education, and finds his basic viewpoint on the essence and regulation of moral education.

**Key words:** Lin Shen-si; human nature; education; moral

(上接第 81 页)

人民出版社,1985.

[27] 吴易风.当代西方经济学流派与思潮[M].北京:首都经贸大学出版社,2005.

## Ideology, informal institution changes and interpretation for “Shaanxi phenomena”

CAI Li-xiong<sup>1,2</sup>

(1. Center for Study of China Western Economic Development, Northwest University, Xi'an 710069, Shaanxi, China; 2. School of Article and Education, Longyan University, Longyan 364012, Fujian, China)

**Abstract:** In order to promote soci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Shaanxi, this article adopts the method of institutional analysis to discuss the institutional reasons of “Shaanxi phenomena”. The author believes that the formation of “Shaanxi phenomena” lies in the existing ideology and informal institution that go behind the modern market economy,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lacks enough motivation and adaptable environment. Because of these, the resources cannot be fully optimized and utilized and the economic growing speed falls far behind its potential growth ratio. Therefore, a necessary way to change “Shaanxi phenomenon” is to reform the old ideology and informal institution. The research results show that the present good conditions in the nation-wide economic reforms should be made full use of, introspection and education should be carried out in promoting its changes and the government behavior, and public opinions should be promoted in leading its changes so that its healthful development can be fulfilled in the change.

**Key words:**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Shaanxi phenomenon; ideology; informal institution